

身体符号的限度： 拜厄特与当代激进身体话语

徐 蕾

内容提要：对于身体在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政治语义场中符号化的倾向，英国作家 A.S. 拜厄特采取了较为审慎的立场。她在《巴别塔》中质疑了 1960 年代残酷戏剧的暴力语言对人类身体尊严与价值的侵越和践踏，通过《中国龙虾》的迫害妄想症个案，指出被无限放大的女性身体解放话语会扼杀女性审美想象力、扭曲自我认知，借助《原材料》暗示了表征身体欲望和语言的“阴性写作”之外，女性书写自我的可能。拜厄特对当代激进身体话语的反思，为深入理解她与后现代艺术理念以及女性主义思潮的复杂关系提供了重要切入点。

关键词：A.S. 拜厄特 身体符号 残酷戏剧 女性身体 阴性书写

作者简介：徐蕾，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身体’视角下的拜厄特小说研究”（11CWW011）成果。

Title: The Limit of Body Signification: A. S. Byatt and Contemporary Critical Discourses on Body

ABSTRACT: In much of her writing, A. S. Byatt has taken a cautious stand on the literary and political signification of body in contemporary critical discourse. In *Babel Tower*, she questions the language of violence in the Theatre of Cruelty which tramples on the dignity and inherent value of the human body. In “The Chinese Lobster”, she reveals the fatal consequences that a feminist obsession with the oppressed female body has inflicted upon women’s aesthetic imagination and self-perception. In “Raw Material”, she suggests an alternative for women to write themselves beyond *écriture féminine*, deriving both language and the writing subject from the body. Reflecting upon the extent

to which body has been signified to feed into a variety of contemporary critical discourses, these writings provide a glimpse into the writer's cautious engagements with postmodern theories and feminism at large.

Keywords: A. S. Byatt, body signification, Theatre of Cruelty, female body, *écriture féminine*

Author: Xu Lei <xu_lei@nju.edu.cn>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210023). Her research interest is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fiction.

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各路激进思潮推动下,身体被赋予越来越丰富的文化与政治内涵,成为女性解放、人性解放、思想解放话语体系中的多价性符号。这一趋势引起了一些前瞻性学者的关注。让·鲍德里亚敏锐地觉察到被解放话语再度政治化的新身体符码与以往身体政治传统的延续性以及符号本身的虚空性。他指出,“在身体之否定性的历史之后,是身体之肯定性的历史。目前‘革命’的多价性完全衍生于这样一个事实:数百年来压抑都把身体基于价值之上。在压抑之下,身体被赋予了僭越一切价值的虚拟性”(67—8)。卷入批判话语涡流中心的身体遭遇各路理论的离心力,其本身实在性被抽空后,跌入让-吕克·南茜所谓的“符号和意义的陷阱”(93)。被符号化的客体在齐泽克看来,具有似非而是的双面性,“它是使缺席‘实体化’的在场,是‘缺席的具体化’”(83)。于是在身体话语的狂欢下,真实的个体身体却隐迹灯火阑珊中。

英国小说家 A.S. 拜厄特(A.S. Byatt)关注身体,写过展现 1950 年代知识女性身心问题的“弗莱德雷卡”四部曲(*Frederica Quartet*),也刻画过中年女性的身体焦虑(Coelsch-Foisner),但对于被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化政治语义场符号化的身体,她却采取了较为审慎的立场。长篇小说《巴别塔》(*Babel Tower*, 1996)和短篇《中国龙虾》(“The Chinese Lobster”, 1993)、《原材料》(“Raw Material”, 2004)等作品传递出作家对 1960 年代兴起的残酷戏剧和当代女性主义滥用身体符号的怀疑与不满,构成她反思后现代激进身体话语的重要线索。

一、残酷戏剧的语言与身体暴力

《巴别塔》是拜厄特“弗莱德雷卡四部曲”中的第三部。如作家所言,它“是一部讲述语言以及语言如何扭曲、创造、改变人生和社会的小说”(“Introduction to *Babel*”)。小说之名借用《圣经·旧约》中人类陷入语言不通、秩序混乱的经典一幕,讽喻 20 世纪 60 年代的英国思想动荡、礼崩乐坏的社会图景——“在意识形态、政治、社会等一切领域都缺乏共识”(Wallhead, *The Old*, 219),并暗中呼应了小说的复调性结构。当小说以四个开头颇具新意地揭开 60 年代的英格兰社会画卷之时,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就被这种并行繁复的叙事方式复活了。这个标榜着反文化、反理性、反传统的红色年代“试图在更广泛的个体自由基础上建构新的社会”(Wallhead, “Un-Utopian” 134),在拜厄特看来“虽令人兴奋,却毫无意义”(“The Salon Interview”),代表的不过是“混乱、叛逆、残忍和破坏”(Roberts 40)。《巴别塔》因而奏响的不是 60 年代热情似火的希望之声,而是“所有新自由中欢快的和愉悦的残酷之音”(Byatt, “Memory” 49)。

作为复调性的残酷意象之一,残酷戏剧(Theatre of Cruelty)也被引入小说情节,参与到作家对60年代历史的呈现中。法国先锋剧作家阿尔托(Antonin Artaud)创立的“残酷戏剧”肇始于30年代初,60年代在欧美剧坛和思想界形成滥觞,对西方严肃戏剧具有划时代意义(朱雪峰73)。残酷戏剧以打破传统戏剧的语言文本根基为己任,试图塑造富于感官冲击力的舞台景观、展现新的生活真实——宇宙对个体的严酷控制和对必然性的屈服(Artaud 102)。当然,所谓的“残酷”并非相互砍打对方的身体、让肉身支离破碎(79),但为了震动人们的“神经和心脏”(84)、“全方位冲击观众的感官”(86)、“让他(观众)犯罪的兴味、固著的色欲、野蛮兽性、妄想、对生活 and 物质的乌托邦想象、甚至使他的嗜血成性由内向外、而非伪造或幻觉般地喷涌而出”(92),残酷戏剧必须“展示和外化潜在的深层残酷,藉此使个体或民族的一切心灵反常的可能得以局部呈现”(30),因而在表现手法上始终难以摆脱“暴力的肉体意象”(82),执着于“在僭越一切界限的极端行为的基础上重建戏剧”的理念(85)。

出现在小说《巴别塔》中的剧目《马拉/萨德》(*The Marat/Sade*, 1964)和《拯救》(*Saved*, 1965)、以及剧作家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埃德蒙·邦德(Edmond Bond)、查尔斯·马洛维茨(Charles Marowitz)正是60年代轰动英国戏剧界的残酷戏剧的代表。《马拉/萨德》全名《在萨德侯爵指挥下查兰顿精神病院病人对让-保罗·马拉进行的迫害和暗杀行为》,是德国剧作家彼得·魏斯(Peter Weiss)1964年的代表作,次年被英国导演布鲁克搬上英国舞台,是残酷戏剧的经典之作。《拯救》乃英国剧作家邦德代表作,作品的上演引发了热烈的社会争议,一度遭到英国首相的禁演令。前者讲述了18世纪末萨德侯爵在疯人院里指挥精神病人们上演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马拉之死,精神错乱的病人们巧妙展现了处于癫狂状态的革命者们失控的暴行:攻击卫兵、强奸修女、蹂躏失足者、谋杀手无寸铁的人。后者拉开了一幅1960年代伦敦社会底层青年暴力十足的生活画面,其中包括一群青年合伙用石头砸死襁褓中的婴孩。

残酷戏剧用“破坏性的语言以破坏人生”(Byatt, *Babel Tower* 169)、以诉诸身体的暴力景观挑战社会道德底限、形成强烈感官冲击的表达方式令小说重要人物亚历山大·韦德伯恩深感不安。亚历山大在“四部曲”前两部中是一位深受传统影响的剧作家,在50年代发表过一些诗剧(verse drama)。在《巴别塔》中,他受邀参加了英国政府委任的语言教育委员会,调查中小学英语教学状况。面对60年代兴起的残酷戏剧,资深剧作家既有所触动,又震惊于演员们挣扎、哀嚎和撞脑袋的仪式。对于这种“鲜血、尖叫和肉体极端的戏剧”,他认为“如此将暴力释放为景观不好”,私下甚至觉得这种做法有些“幼稚”(169)。身为剧作家的亚历山大在四部曲中数次代言拜厄特在文学创作上的理念,比如他在《庭院中的处女》(*The Virgin in the Garden*, 1972)中对后现代自反性和现实主义的观点暗合拜厄特的实践主张(18);此处人物对残酷戏剧的保留意见或许也可以视为作家立场的又一次曲折表达。

《巴别塔》的嵌入作品《胡言乱语塔》也暗示了拜厄特对残酷戏剧诉诸极端暴力的舞台语言的批判。故事中,一批笃信“自由”和“人性”的理想主义者们为逃离法国大革命的恐怖屠杀,来到一处与世隔绝的林中之城堡。为建设新生活,他们设计了一系列以剧场表演为形式的集体聚会,根据表演内容,分为语言剧场、欢笑剧场、痛苦剧场和牺牲剧场等。然而随着众人追求个人自由和快感满足的无限发展,这些剧场演变为展现肉体痛苦、折磨、暴虐、乱交的舞台,直至演变为集体迫害个体乃至互相残害的刑场。作家的用意相当明显,失控、放纵、为所欲为的舞台表演会激发人内心最具破坏力的阴暗面,最终导致现实中的暴虐横行、生灵涂炭。

实际上,置疑残酷戏剧语言和身体暴力的声音不仅来自作家。有评论家指出,“在阿尔托

的体系中,身体被定位于表演的功能整体内符号平面的结构位置上,永远指涉它物”(Krysinski and Mikkanen 155—6),与人的生命尊严和价值感无关,只是作为可以被剧作家任意使用、变形、扭曲的符号而存在。彼得·魏斯和爱德华·邦德都倾向于把身体视作政治单元,看重它在政治力量游戏中的功能和在主体性和外力征服斗争中的角色(Garner 146)。在他们的戏剧作品中,身体最普遍、最紧迫的形式莫过于饱受痛苦和侵犯的处于极端的躯体,这些受难的身体不再是外化生产力的所在或个人和社会生活环境的中心,变成了缺乏人类接触的非现实世界中自我封闭的感知点。当身体失去了承载自我超越的主体性的地位,它就在剧作家们张扬其令人瞠目结舌的感觉中被客体化了(152)。换言之,被推至生理极限的肉体变成了没有个体生命的空洞的政治符号,或者作为欲望的所在推动新世界的形成和秩序的转变,体现着革命的意识形态,或者代表着社会转型道路上必须克服的障碍(153—4)。尽管邦德等人声称表演暴力的目的在于让观众们面对自身的暴力,但评论者认为,剧作家的作品只是让观众们接受他们塑造的残酷、混乱的世界,并未带来任何救赎希望(Hunt and Reeves 94—5)。

诚然,在西方现代文艺思想转型阶段,身体常会作为一面与传统分道扬镳的旗帜、被不同时代的艺术家挪用,如德国狂飚突进运动中有许多年轻的戏剧家通过表现性欲的、怪异的、丑陋的和疾病的身体,动摇现存的文化价值体系(Gustafson)。值得思考的是,艺术家在借用身体符号传递审美主张与政治诉求时,是否应当顾及身体的生命尊严及其本真价值?身体的符号化是否需要控制在一定的道德伦常范围之内?对于更赞赏循序渐进的变化而决裂、颠覆、革命的拜厄特而言(“The Salon Interview”),残酷戏剧所包含的语言与身体暴力也许都存在一个“度”的问题。

二、女性身体与迫害妄想症

身体不仅是残酷戏剧符号化的客体,也是20世纪后半期女性主义批判父权制文化的重要标杆和政治符号。拜厄特虽然在政治上关注女性自由、支持女性独立,却对女性主义旗帜下的身体话语心存疑虑。她发觉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形成的分析框架和话语权威越来越左右着女性个体的思维能力与想象力(“The Salon Interview”),而当身体解放话语被教条化并无限放大,甚至被奉为女性认知和交往的金科玉律,其后果将是个人审美想象力的萎缩和身体符号本身的庸俗化。

收录于《马蒂斯故事》(The Matisse Stories, 1993)的第三篇故事《中国龙虾》就是一个例证。女性主义理论对身体的政治符号化不仅左右了女性审美判断力,还严重影响到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价值观。故事的背景是:艺术系女大学生蓓吉·诺赖特向女学监格尔达·希梅尔布劳指控她的论文导师佩里·迪斯没有认真指导自己写作《女性身体和马蒂斯》为题的博士论文,并对自己实施性骚扰。收到学生申诉的格尔达邀请佩里在一家中国餐厅吃饭,但二者的交谈并没有止步于简单的事实调查,两个热爱艺术、也遭遇过生命低谷的人之间逐渐产生了惺惺相惜之感。这样的结局安排一度引发了不少女性主义者的不满(“The Salon Interview”),因为作家没有给予“弱势”一方足够同情:女学生蓓吉被表现得缺乏艺术天赋,她的性骚扰指控很可能是厌食症引发的迫害妄想,而她对马蒂斯裸女画像的涂抹和“改造”更像是亵渎艺术的无知行为。她的厌食、艺术鉴赏力的匮乏和人际交往障碍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激进女性主义的深刻影响。

拜厄特在访谈中直陈“不喜欢因执念而无视的人”(“The Salon Interview”),蓓吉应该算

是典型。有着强烈女权意识的蓓吉认为,男性与女性的对立和隔阂不但无所不在、而且难以克服;而作为男性霸权和两性冲突焦点的女性身体也演变为女性抵制男性控制、侵犯和情欲化的战斗堡垒,需要女性主体保持高度警觉和充分发挥维权意识。因此,对马蒂斯缺乏认知的蓓吉把这位现代主义大师绘制的裸女看作男性对女体的扭曲和夸张——色情化凝视的结果,进而认定画家对女性充满了敌意,并据此创作了一组旨在颠覆马蒂斯经典画作的“抗议”作品。她用血液和粪便污损、涂改马蒂斯作品的复件,重新勾勒画中人物身体或脸庞的轮廓。蓓吉的“再创作”深深激怒了导师佩里,后者深信马蒂斯呈献给我们的是“事物本身”(“Chinese Lobster” 124),表现着“平衡、纯粹和宁静的艺术”(123),可以让绝望的人生变得能够令人忍受。因此他很难接受蓓吉对艺术大师的肆意侮辱和贬低,认为她根本没有看清马蒂斯艺术的真实面貌,只是“在脑中把一切都搅和在一起,将一切合并成一具充盈着男性侵略的巨型女体”(113)。佩里对蓓吉视野狭隘、观念偏执、只知搬弄当代理论观点的评判,与拜厄特多次指责女性主义者分析文本或艺术品时受意识形态先入为主的影响、导致一叶障目和断章取义几乎如出一辙。不难看出,就艺术审美价值观而言,拜厄特与佩里的立场非常接近。^①

萦绕于蓓吉心头的女性迫害妄想症不仅表现在她的艺术审美和实践上,还渗透到她与男性的正常交往中。她认定教授对自己观点和作品的否定源自性别歧视,声称所谓的专家和大师根本不知道失去发言权的女人和她们没有言说能力的身体,因而拒绝接受批评意见,认为他不合适指导自己的论文。更有甚者,当佩里建议因患厌食症而面色阴暗、身形消瘦的蓓吉脱去身上层层包裹的脏衣服、让营养不良的身体透透气时,她立刻把老师的举动当作性骚扰的前奏。讽刺的是,蓓吉才是自我迫害的“真凶”。她想象自己是“一个黑袋子里的死尸”(106),用饥饿虐待自己的肉体、以自杀威胁生命,这种心态正如熟悉女性青年心理的格尔达所说,“源自自我仇恨和自我关注,尤其是对身体和与我们如影随形的自我身体形象的仇恨和关注”(119)。她们痛恨自己难以在现实中消除男权制社会对女体的监控和压迫,只能完全沉浸在个体世界中,防范一切可能作用于自我身体的外来压力和内在的性成熟,让身体完全处于自我控制之中。对于满脑迫害妄想的蓓吉来说,绝食自然成为她从根本上击败男权控制、杜绝男性迫害女性肉体的一切可能性的终极方案。但是这种极端手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成就了女性自我解放的理想呢?苏珊·博度对此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她指出,这些以节食为手段的女性抗议行为实际上成了男权文化的同谋,“她们被卷入了一种完全南辕北辙的情况,参与了一场毫无致胜希望的游戏。……厌食症患者把自己对瘦削毅然决绝的追求与权力和控制相联系,……实际上毁坏了她的健康、束缚了自己的想象”(Bordo 164)。^②绝食者把自己的身体化为女权政治运动中的一枚符号,以自己的生命健康为代价换取对自我肉体 and 命运的绝对控制,从根本上表达了对肉身的厌恶和否定(Campbell 175)。这不仅动摇了女性争取个体幸福的物质根基,而且使身体的意义萎缩在教条的性别政治范畴中,严重限制了女性对自我和身体的认知。因此,蓓吉对马蒂斯裸女作品的改造虽然意在消除马蒂斯对女性身体的扭曲,却适得其反地扭曲了身体之于画家和她自己的真实意义(Petit 119)。

激进的女性主义话语把女性身体纳入男女对立的僵化格局、囚禁于迫害妄想症的牢笼,在对女性身体普遍政治化的同时,也扼杀了身体多重意义的可能。旅居英国的当代女艺术家哈透姆(Mona Hatoum)曾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就部分女性主义者对女性身体偏狭的政治立场表达过不同看法:

在早期女性主义看来,任何对于女性身体的表现都是对于女性的剥夺和客观化。这一问题后来得到了重新认识,因为这样女性就在一定意义上退场和消失了。当我以我的母亲为原型创作出《距离的单位》时,我也被他们指责剥夺和打碎了女性身体,就像色情作品受到了批评一样。我感到,这是一种非常狭隘的对于女性主义理论的主观和字面的解释。我将自己的作品看作对于丰腴成年女性的美丽的讴歌,就像威兰德夫·维纳斯——并不像我们在媒体中看到的那样。如果你将这部作品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它构建了一个女性人格、需要、感情、渴望、信仰的美妙丰满的形象,并将她完整地置于一种社会语境中。(qtd. in Archer 41)

艺术家的话从另一个角度重申了故事传达的立场:进入艺术审美的女性身体具有多种可能性,不应局限于某种特定的女性主义视角,观者应当尊重艺术家再现女性身体的具体情境;同时,试图清算男权社会对女性身体控制和压抑的努力走到极至便是用另一种以偏概全的意识形态,无异于以反叛、解构、颠覆的革命姿态给女性身体穿上新的“紧身衣”。

三、“阴性写作”之外

“阴性写作”(écriture féminine)是1970年代发端于法国女性主义理论界的一股激进身体话语,最早由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西克苏(Hélène Cixous)在《美杜莎的笑声》(“The Laugh of Medusa”, 1975)中提出。西克苏以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为基础,将身体与无意识的本我相联系,认为书写、释放身体的欲望可以抵抗男性文化或超我对女性自我的压抑:“你的欲望必须被人听见。只有此时,无意识的无限资源才会喷涌而出”(350—1)。西克苏“书写身体”的呼唤经由伊瑞格利(Luce Irigaray)、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等人的进一步发展,逐渐指向用女性身体话语的离散性、循环性取代男性语言的直线性和理性特征。她们认为,一直没有遭受男性文化殖民的女性身体经验可以直接产生一种自由的阴性写作,通过书写女性特有的身体感受和欲望,超越男性菲勒斯中心主义。

阴性写作的理念影响了70年代以来许多西方女性作家,女性身体的经验、性征和欲望被赤裸裸地铺陈在碎片化的、非线性的、无视语法规则的文字组合中。但拜厄特对其语言观和创作理念均持怀疑态度,这可以从她1974年为惠蒂格(Monica Wittig)的小说《同性恋身体》(The Lesbian Body)写的书评中得见一斑。拜厄特对这部从语言风格和主题内容上都实践着阴性写作的经典文本很不以为然,认为作品“强加给读者的视野太过单薄、扫兴、简单,色情内容教条而狭隘”,她甚至一反平日的含蓄文风,在结尾处声称自己非常高兴写完了这篇书评,得以解放去读点别的东西了(“Monique Wittig” 276)。面对阴性写作指向的语言革命和性欲主题,她坦言自己喜欢变化而不是革命、“连续语言中微妙的差异而不是教条主义式的违规”(276)。与其横空创造出某种与男性写作语言截然对立的写作模式和语汇,女作家不如在汲取包括经典男性作家作品在内的文学传统的基础上,把故事讲好。

收录于《黑色小说故事集》(Little Black Book of Stories, 2004)的《原材料》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视作对“阴性写作”的一次反拨。故事讲述的是,中年作家杰克·斯莫莱特已多年没有创作的冲动,靠教授写作为生。写作班上的成人学生一般或取材社会新闻时事,写暴力、强奸、凶杀故事,或转向个人生活,记录心灵崩溃的历程。唯有一位耄耋之年的女学生塞西莉·福

克斯与众不同,写了一篇《我们过去怎样用石墨擦火炉》(“How We Used to Black-Lead Our Stoves”)的故事,从容细致地描述了在现代灶具和洗涤剂出现之前、人们家庭日常生活中某个温暖的真实瞬间。福克斯的作业立刻吸引了杰克的视线,后者感到自己的想象力第一次被学生作品唤醒了。不久,福克斯的另一篇故事《洗衣日》(“Wash Day”)以同样风格追忆了童年时代家庭妇女们日复一日浆洗衣服的艰苦工作,这让老师愈发坚信福克斯的才能,他认定她写出了“真正的东西、事物本身”(189)。于是杰克私下把福克斯的两篇文章寄给了某项写作大赛委员会,她的作品果然获得了第一名。然而就在杰克带着获奖消息、首次登门拜访一向行事低调的福克斯时,惊人的一幕出现了:福克斯刚刚被同居多年的女友杀害。杰克第一次看到了总被衣服和围巾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福克斯的身体:已经停止呼吸的身体上布满了各种伤疤、疤痕、鞭迹、小圆型的烧焦印迹和新鲜的伤口。没有人能够说得清福克斯和她女友之间有着怎样离奇的关系、或她遍及全身的新旧伤痕到底诉说了怎样的人生。唯一能够肯定的是,福克斯伤痕累累的身体和她与女友长年同居的个人隐秘并没有成为她写作的“原材料”。

至此,故事标题“原材料”的含义似乎为理解作品颇为晦涩的结局开辟了一条蹊径。“原材料”显然指向的是作家从现实生活中摄取的素材。辍笔多年的杰克一直为素材问题所困扰,而福克斯讲述的故事让他看到了“原材料”的其它可能。其次,原材料对作家而言也意味着语言本身。福克斯表示自己写作是因为喜欢文字,她对词与物关系的准确把握使她的语言超然于“如污迹般蔓延在写作世界里的陈词滥调”(180)。福克斯的语言风格是打动杰克、激发他写作欲望的根本原因。此外,如果把 raw 的词义理解为“疼痛的”、而不是“未经加工的”,那么“疼痛的物质”又在暗中提示着福克斯遍体鳞伤的身体。杰克曾谓福克斯的作品“在不只一个层面上同时展开”(179),故事的标题也包含着多个同时发生作用的所指——写作素材、语言和女性身体。福克斯的故事因此也可以被视作拜厄特对素材、语言、身体三者间关系的一种探究。颇具深意的是,法国女性主义者倡导的“阴性写作”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正是对三者关系的大胆构建。她们把女性身体塑造为对抗男性逻辑思维和理性文化的关键符号,置于写作活动的中心,为写作内容和语言提供完全不同于男权文化传统的新资源。因而阴性写作不仅书写女性身体的性征、欲望、痛苦、快感,更以女性身体特有的生理规律和高潮模式为基础重新构建语言运作的方式,强调断裂、涣散和非逻辑性。

然而,拜厄特笔下的福克斯却改写了“阴性写作”概念下素材、语言和女性身体之间的关系。和许多“阴性写作”的实践者一样,福克斯写作也是为了寻找治疗心灵创伤的良方,但是她的作品呈现了“阴性写作”之外女性书写内心的另一种方式:饱受折磨的身体既没有进入叙写的主题、也没有融入文字的肌质。但福克斯对童年家庭生活如行云流水般的记叙看似波澜不惊,平凡琐屑的日常生活表象之下却隐藏着对荒诞人生的深刻拷问:家人日复一日地用石墨擦拭锅炉为的是用石墨的深黑色遮掩锅炉上深深浅浅的黑色,全然不知石墨的毒性;被关节炎折磨的母亲一辈子坚持蒸煮式洗衣,不愿使用先进的洗衣机,直到完全无法应付越来越多的脏衣服,因为她“需要蒸汽和搅拌衣物确认她的存在和德行”(188)。由此看来,福克斯身上的累累伤疤或许是她确证自我存在的另一种荒诞手法。

在这里,肉体创伤以一种奇特的方式为这位女性提供了创造力的隐秘源泉。斯卡里(Elaine Scarry)在《痛苦中的身体》(*The Body in Pain*)中提出,身体对痛苦承受的能力是人类创造世界、艺术品与小说的根本文化活动源泉。她认为,“痛苦在整个心理、肉体 and 知觉状态组织中因为没有对象而具有特殊性。尽管体验肉体痛苦的能力和听觉、触摸、欲望、害怕和饥饿的能力

一样,都是人类的一个基本事实,与其它肉体和心理活动不同的是,痛苦在外部世界中没有对象”(161)。因此,对痛苦的表述和传递极其困难:对于一位遭受痛苦的人来说,痛苦有着无上的力量,这一事实有时甚至将他人排斥在外,而对于那些仅仅听说了痛苦的人来说,痛苦又何其难以捉摸。横亘于痛苦与表达之间的鸿沟在忍耐与沉默中蕴藏着无限的言说能量,或以“阴性写作”的方式直接爆发,或在隐忍中积淀下来,化为福克斯字里行间无言的呐喊,让读者于无声处听惊雷。

值得一提的是,后者对女性主体的意义不一定就逊色于前者。虽然西克苏高呼“书写你自己”、“你的身体必须被人们倾听”(Cixous 350),但言说者并不一定是权力支配者,说话的人并不总是在说话者/倾听者这对关系中占据有利位置。以忏悔自白为例,倾听者默默无语地了解事实,获得对言说者的控制。科沃德(Rosalind Coward)就曾指出文学自白在双重意义上被性化了——倾诉的内容围绕着性,倾诉者是女人。现代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已经变成说话的女性,她喋喋不休的说话内容就是性本身,女性因而被永久地打入感性人际关系的私人空间(178—9)。反之,保持缄默的福克斯虽不曾言说自己的身体隐痛,却泰然坚守着自己的人格和话语权——她既不因为杰克的赞赏而沾沾自喜,也不为其他同学的批评而恼羞成怒,在远离“阴性写作”的同时找到了表达自我的语言和愿意聆听的耳朵。

结语

自60年代以来,身体符号常被艺术家、理论家用以表达激进的创作理念和政治、文化立场。残酷戏剧把极端的肉体暴力作为与传统戏剧语言、文化价值和社会秩序断裂的表征,女性主义者把女性身体视为抵制、颠覆男权文化的依据和原动力。但当身体被化约为舞台的表达介质,其自身的完整性和独立性是否会被暗中消解、遗忘?或当身体被纳入女性解放的话语框架,所包含的符号意涵是否会僵化女性解读自我和身体关系、形成打着解放旗号的话语霸权?女作家除了围绕性经验和身体语言的“阴性写作”之外,有没有言说自我的其它可能?《巴别塔》、《中国龙虾》、《原材料》通过上述问题的提出,传达了拜厄特对身体符号限度的质疑与思考,为深入理解她与后现代艺术理念以及女性主义思潮的复杂关系提供了重要切入点。

注解【Notes】

- ① 法国画家亨利·马蒂斯是拜厄特非常推崇的艺术家,从作家以马蒂斯画为重要背景发表的故事集《马蒂斯的故事》和1998年为新版《马蒂斯传》撰写书评就可见一斑。参见A. S. Byatt, “Book Review of *The Unknown Matisse, A Life of Henri Matisse: The Early Years, 1869-1908*”, *The Guardian Weekly* 6 Dec. 1998: 28; Lewis Burke Frumkes, “A Conversation with A. S. Byatt”, *The Writer* 110.5 (May 1997): 15-16.
- ② 学界对神经性厌食症患者的心理动机至今并没有形成定论,学者们的分析大致可分作两类,一是父权社会意识形态强调女性身体的苗条和贬低肉体的结果,二是女性拒绝性属角色、抵制男权控制和生理想运的反应。如Anna Krugovoy Silver对维多利亚时代妇女神经性厌食症的多角度解析,参见*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the Anorexic Bod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P, 2002)。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 Archer, Michael, et al. *Mona Hatoum*. London: Phaidon, 1997.
- Artaud, Antonin. *The Theatre and Its Double*. Trans. Mary Caroline Richards. New York: Grove, 1958.
- Baudrillard, Jean. “The Body, or the Mass Grave of Signs.” *Postbodies: Culture, Power and Biopolitics*. Ed. Wang

- Min'an and Chen Yongguo. Changchun: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3. 35-68.
- [让·鲍德里亚:《身体,或符号的巨大坟墓》,载汪民安、陈永国编《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5-68页。]
- Bordo, Susan. *Unbearable Weight: Feminism, Western Culture, and the Body*.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 of California P, 1993.
- Byatt, A. S. *The Virgin in the Garden*.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78.
- . *Babel Towe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7.
- . "Introduction to *Babel Tower*." 9 May 2006 <http://www.asbyatt.com/oh_Babel.aspx>.
- . "Memory and the Making of Fiction." *Memory*. Ed. Patricia Fara and Karalyn Patter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8.47-72.
- . "Monique Wittig: *The Lesbian Body*." *Passions of the Mind: Selected Writings*.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91. 245-50.
- . "Raw Material." *Little Black Book of Storie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4. 157-95.
- . "The Chinese Lobster." *The Matisse Stories*.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93. 91-133.
- . "The Salon Interview with Laura Miller." 6 May 2006 <<http://www.salon.com/weekly/interview960617.html>>.
- Campbell, Jane. A. S. Byatt and the *Heliotropic Imagination*. Waterloo: Wilfrid Laurier UP, 2004.
- Cixous, Hélène. "The Laugh of Medusa." *Feminisms: An Anthology of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Ed. Robyn R. Warhol and Diana Price Herndl.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Macmillan Press, 1997. 347-83.
- Coelsch-Foisner, Sabine. "A Body of Her Own: Cultural Constructions of the Female Body in A. S. Byatt's Strange Stories." 22 March 2006 <<http://http://reconstruction.eserver.org/Issues/034/coelsch.htm>>.
- Coward, Rosalind. *Female Desire: How They are Sought, Bought and Packaged*. New York: Grove Weidenfeld, 1985.
- Garner, Stanton B. Jr. "Post-Brechtian Anatomies: Weiss, Bond and the Politics of Embodiment." *Theatre Journal* 42. 2 (May 1990): 145-64.
- Gustafson, Susan. "Goethe's Clavigo: The Body as an 'Unorthographic Sign'." *Body and Tex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d. Veronica Kelly and Dorothea von Mücke. Stanford: Stanford UP, 1994. 229-46.
- Hunt, Albert, and Geoffrey Reeves. *Peter Brook*. Cambridge, New York, Melbourne: Cambridge UP, 1995.
- Kristeva, Julia. *The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 Trans. Margaret Waller. New York: Columbia UP, 1984.
- Krysinski, Wladimir, and Raili Mikkonen. "Semiotic Modalities of the Body in Modern Theater." *Poetics Today* 2.3 (Spring 1981):141-61.
- Nancy, Jean-Luc. "Body." *Postbodies: Culture, Power and Biopolitics*. Ed. Wang Min'an and Chen Yongguo. Changchun: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3. 89-107.
- [让—吕克·南茜:《身体》,载汪民安、陈永国编《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9-107页。]
- Petit, Laurence. "Textual and Pictorial Distortions: Sublimity and Abjection in A. S. Byatt's 'The Chinese Lobster'." *Études Britanniques Contemporaines: Revue de la Société D'Études Anglaises* 31 (Nov. 2006): 117-26.
- Roberts, Michele. "The Sixties on Trial." *New Statesman & Society* 3 May 1996: 40.
- Scarry, Elaine. *The Body in Pa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World*. Oxford: Oxford UP, 1985.
- Wallhead, Celia. "The Un-utopian Babelic Fallenness of Language: A.S. Byatt's *Babel Tower*." *Dreams and Realities: Versions of Utopia in English Fiction from Dickens to Byatt*. Ed. Annette Gomis & Miguel Martinez. Servicio de Publicaciones: Universidad de Almería, 1997. 133-50.
- . *The Old, the New, and the Metaphor: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Novels of A. S. Byatt*. London: Minerva Press, 1999.
- Zhu, Xuefeng. "Derrida and Baudrillard: Postmodern Interpretations of the Theatre of Cruelty." *Literature & Art*

Studies 10 (2010): 71-81.

[朱雪峰:《德里达和波德里亚:残酷戏剧的后现代诠释》,《文艺研究》2010年第10期,第71-81页。]

Žižek, Slavoj. "How to Entrap Bodies." *Postbodies: Culture, Power and Biopolitics*. Ed. Wang Min'an and Chen Yongguo. Changchun: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3. 69-88.

[斯拉沃·齐泽克:《如何令身体陷入僵局?》,载汪民安、陈永国编《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9-88页。]

(责任编辑:朱云)

“21 世纪外国重要作家专题研究”研讨会会讯

《当代外国文学》编辑部和江苏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拟于2015年7月3—6日举办“21世纪外国重要作家专题研究”全国学术研讨会。会议地点为江苏省常州市。

一、会议主题:

1. 美国作家:品钦(Thomas Pynchon)、罗斯(Philip Roth)、福厄(Jonathan Safran Foer)、奥尼尔(Joseph O'Neill)、麦凯恩(Colum McCann)、德里罗(Don DeLillo)、奥斯特(Paul Auster)、多克托罗(E. L. Doctorow)、路易斯·厄德里克(Louise Erdrich)、莫里森(Toni Morrison)和邝丽莎(Lisa See)等; 2. 英国:克雷丝(Jim Crace)、麦克尤恩(Ian McEwan)、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巴恩斯(Julian Barnes)、拉什迪(Salman Rushdie)、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莱辛(Doris Lessing)、奈保尔(V. S. Naipaul)、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史密斯(Zadie Smith)、库莱希(Hanif Kureishi)和品特(Harold Pinter)等; 3. 法国:让-克里斯托夫·吕芬(Jean-Christophe Rufin)、勒克莱齐奥(Jean-Marie Gustave Le Clezio)、莫迪亚诺(Patrick Modiano)和图森(Jean-Philippe Toussaint)等; 4. 德语作家:穆勒(Herta Muller)、耶里内克(Georg Jellinek)等; 5. 俄罗斯:索罗金(Vladimir Sorokin)、叶利扎罗夫(Aleksandr Matveyevich Yelizarov)等; 6. 澳大利亚:凯里(Peter Carey)、卡斯特罗(Brian Castro)、蒂姆·温顿(Tim Winton)等; 7. 加拿大:门罗(Alice Munro)、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和翁达杰(Michael Ondaatje)等; 8. 爱尔兰:多伊尔(Roddy Doyle)、班维尔(John Banville)和希尼(Seamus Heaney)等; 9. 日本:大江健三郎(Kenzaburo Oe)、村上春树(Haruki Murakami)等; 10. 其他国家作家:南非的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John Maxwell Coetzee),秘鲁的略萨(Mario Vargas Llosa)、哥伦比亚的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和土耳其的帕慕克(Orhan Pamuk)等。

二、论文要求

与会者请于2015年5月15日之前将回执与摘要寄回研讨会邮箱jsutliterature2015@163.com。

三、联系方式

姚云帆:18360827917;解 薇:13861005868;

潘学红:13912315718;王维倩:13585311606;李顺春:13961454988;

《当代外国文学》编辑部
江苏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